

2001

千禧今天

06

東亞 的安全和穩定



路易斯·雷唐·托梅

2001
06

千禧今天
叢書

東亞的安全和穩定

路易斯·雷唐·托梅*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MACAU
澳門國際研究所

*路易斯·雷唐·托梅現任里斯本自治大學教師、歐洲議會助理。是許多關於戰略與國際問題的文章、隨筆和出版物的作者，其中著名的是“太平洋盆地西北部的安全和穩定”(UAL出版社，2001年2月，303頁)以及“同一性和歐洲安全與防禦政策”(對外關係觀測站與UAL出版社，2001年7月，201頁)。這篇文章是應澳門國際研究所之邀於2001年11月23日在澳門舉行的、關於同一主題之講座的基礎。

出版資料

出版：澳門國際研究所

書名：東亞的安全和穩定

作者：路易斯·雷唐·托梅

叢書“千禧/今天”第六冊

第一版/2001年11月

編輯：官耀龍

平面設計：victor hugo design

校對：談霏

印刷裝訂：澳門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情：1000本

ISBN 99937-620-7-5

IIM-澳門國際研究所

地址：新口岸新填海區柏林街南鴻花園二樓

電話：(853) 751 727 / (853) 751 767

傳真：(853) 751 797

電郵：iim@macau.ctm.net

引言

我將從對“東亞”稱呼的思索開始。在很多時間裡，我們歐洲人曾把今日劃定為“東亞”或“亞太”的地區叫做“遠東”。“遠東”的概念明顯與兩個因素有關：相對於歐洲的亞洲地理情況以及歐洲的殖民擴張。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此的稱呼難以超越歷史的進化。另一方面，美國作為太平洋霸主的出現，對他來講亞洲不在東方而在西方。在他的影響下，也讓我們歐洲人開始進而使用“東亞”或“亞太”的表達法。加上我們要在這裡分析亞洲東北和東南地區的安全和穩定，它們事實上位於亞洲的東部。顯然，我不想以關於稱呼該地區最佳方法的煩人分析來引入正題，但對於這個目標有兩個我想強調的事實：即命名法可以由於政治觀點和 / 或欲望多次改變，而且我們不能以已過時的概念和價值來評價新的現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組織國際與地區關係的兩極秩序已不復存在。但與該時期相比，這種“冷戰後秩序”（單就它本身就表現出缺乏一種更好的釋義來描述它的命名）更為不確定而且難以預知。在東亞，政治地理的新面貌由神話般的經濟增長及其衰弱、由專制和民主共存、由國家間關係重大改善所展現，但也被有爭議而且快速的軍事現代化與大國間日益增長的競爭勾勒出來。沒幾年，亞太戰略環境徹底改變了，但對於“亞洲和太平洋世紀”的期盼漸漸給予了對“亞洲巴爾干化”深深的恐懼以及對該地區的不安全感。同樣在世界的這個地區，新秩序在一種明顯較為積極的氣氛中更易發揮。本質上，而且像我們先前看到的，現在東亞有一種傳統的安全困境。

新秩序與傳統安全困境

冷戰期間，儘管地區政治同時與其他現象共存——從擺脫殖民化到內戰，從“熱戰”（印度支那和朝鮮）到另一場中蘇之間的冷戰，東亞表現出國際格局的兩極結構。然而，隨著**雙重冷戰的終結**，展現出在易變的決定因素中對亞太地區**安全意義重大的變化**：

- **蘇聯的內破裂**：——如果這不意味著一種“力量空虛”或該地區不穩定性的增加——讓**美國放棄了他的抑制戰略**，修改其在太平洋的戰略並重新在該地區佈署其軍事設備；讓**中國加緊了其戰略安全**（從蘇聯包圍的沉重威脅中解脫出來）並且重新向南方和海洋區域轉移；讓**日本**不再被看作美國在抑制共產主義的高級“航空母艦”，永久放棄了“吉田政治”並恢復了政治—戰略野心；讓**韓國**大大改善其與俄羅斯的關係，而**朝鮮**則被其強大的盟國之一捨棄。

- **經濟地理因素獲得優勢並在該地區國家間關係中展現出明顯的改善**，表現在剛開始的地區合作進程中，如目睹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擴展，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和東南亞國家聯盟地區論壇（ARF）的創建，以及在至2003年東南亞國家聯盟自由貿易區（AFTA）和2010年至2020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方面自由貿易區創建方面的所投下的賭注。相應地，**某一種“亞洲的同一性”**開始了其發展。它基於面臨競爭和溶入世界其他地區的進程，以及面對著所謂的“西方價值”而設想的“亞洲價值”；這表明在“二十一世紀——太平洋的世紀”問題上對亞太地區明顯信任的增長。然而，對經濟地理因素賦予的最大優先權使得**新貿易緊張同樣出現在**不論是這些亞洲國家之間，還是主要在他們與“西方”之間，其中特別是美國——明顯地在於其與日本盟友的關係以及與中國的關係。
- **雙重“冷戰”的結束驅散了在地區或亞地區的爭執與全球力量的權衡之間的束縛**，於是這些分歧已“**地區化**”或本地化，也就是說，不再直接卷入到大國政治地理的計算之內。尤其是少了主要強國之間的公開矛盾，使得在一種特別穩定的氣氛中地區安全綜合體的重新衡量成為可能。這讓**紛爭的解決**也好——柬埔寨和東帝汶，對於**關注緊張狀態更大的公開**也好——就像在朝鮮，成為可能。然而，這種較大的戰略自主同樣為**紛爭與分歧的再現**（台灣，尖閣 / 釣魚台諸島，斯普拉特利群島和帕拉塞爾群島）、**舊爭鬥的復蘇**（中日和中美）以及**積恨的展露**（中日、日韓，中越）打開了道路。

反共獨裁制度失去意義，一些社會的民主化進程中進展重大（韓國、台灣、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仍正式為共產主義（中國、越南、朝鮮）制度與該地區其他各種制度間共存也更為容易了。順便也不能不提一下，與歐洲的情況相反，既然冷戰在亞洲的結束並不是與共產主義制度的消失相一致，事實仍是最清楚地揭示出這些亞洲制度的民族主義根基。這種情況，儘管此時此刻沒有引發一場真正的思想上的爭鬥，意味著在亞洲還有著對政治自由化思想抵制的廣闊空間，而且在那個地區許多方面都可以嘗試沿著可能“更亞洲化”及選擇西方式的民主的政治路線前進，使市場經濟及經濟自由化與權威制度及政治權力獨享體制相符。

這些及其他我們可以舉出的變化表明，亞洲國家發展其政治的氛圍遠比冷戰的構思更為積極、更加溫和。然而，這種“冷戰後新秩序”更不確定、更易變，所以比原來的兩極秩序更為難以預測。這種反常的情況基本上源於四個因素：因為正在重新確定力量平衡的過程中；繼續在解決無數的紛爭和分歧，其中許多都牽連著大國；潛在爭購武器裝備被證實；以及持續缺乏有關安全問題的地區合作和地區組織。在亞太地區，沒有像歐洲安全和合作組織（OSCE）的有關安全合作論壇，或是像歐洲理事會的政治辯論。而且像歐洲聯盟（UE）的地區一體化人員，或是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那樣對舊大陸穩定與安全根本性的安全組織少得很。在此方面剛開始的、最近的首創，東南亞國家聯盟地區論壇值得頌揚而且應該支持並好好利用；它一直以

來在解決分歧中以及在游說一種持久安全和穩定的新秩序的努力中效用不大。

力量新平衡的重新排列

這個兩極後的新時期，在東亞逐漸展現出的所有改變之中最具決定性影響的毫無疑問地是在**大國之間正在進行的力量平衡的重新排列——美國、俄羅斯、中國和日本**；儘管日本進展得緩慢而又野心勃勃。新地區秩序取決於它的進展和明確，而且可能取決於世界。加上由於亞太地區在多邊結構或制度中沒有相互信任的人員配備，關係的規格通常被引導並在**雙邊基礎上**相遇。也就是說，新力量平衡的根本經歷著**大國的作用和地位的進展**，而且經歷著一種分級和 / 或它們關係的穩定。

1991年蘇聯的解體及其為**俄羅斯**代替，只是證明了莫斯科對亞洲事務中力量和影響的衰落。陷入在一種混亂又創傷的轉折中，**新俄羅斯一直未能控制其在影響亞太命運能力方面的持續衰落**：這一點的證明如：只是在很晚才加入亞太經濟與合作組織，沒參加歐亞峰會（恰恰是一個歐亞國家），沒參與朝鮮四方會談（南、北朝鮮，中國和美國），也沒有在建立朝鮮能源發展組織（KEDO）中合作。**出於地理原因，他的遠東保證了其在東北亞剩餘的重要性**，但由於他的不發達以及“釘釘子”的地理戰略不足以保證他太平洋強國的地位。俄羅斯既沒有對手也沒有地區盟友，意圖中野心勃勃

但能力和施政上謹慎適度。他在與中國的“戰略伙伴”上下賭注，來恢復一些地位和干預的能力，與該國那時候實際上解決了所有邊界分歧。這種合伙的限度很重要，但它毫無疑問地成為對美國的領導權和態度的一種補充對抗。在新秩序中，俄羅斯的作用和地位直接取決於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水平所達到的進展。但也肯定，要想再展現與其前身蘇聯相似的力量和影響能力，則有一條很長而且艱苦的路要走。這樣，也許基本上力量新平衡的佈局由被認為是美國、中國和日本組成的戰略三角形。

由於其平衡作用，美國是太平洋安全架構根本性的關鍵。冷戰的結束和經濟復蘇的需要使華盛頓在經濟地理方面更多地重新思量其對亞太的戰略，並且重新確定在該地區現有的軍事設置。美國宣佈了“約定”和“擴展”的概念作為教條，並保持在該地區與安全、經濟增長以及自由民主價值擴張相關的根本利益。為了要創立和鞏固它們，美國的領導人士懂得必須要在該地區保留重要而且可信的軍事存在，必須保持先前建起的雙邊關係，即與日本的聯盟，並且推動多邊合作形式。美國的戰略根本上仍繼續由保持現狀並領導重新確立新秩序的目的為基礎，儘管他承認想與地區強國分擔這種作用。為了使力量平衡繼續傾向有利於他，華盛頓甚麼都會做。所以，盡力說服他的亞洲盟友們擔任國防的新職責以及承擔在維持地區穩定上的新責任。事實上，美國的出現仍受亞洲精英們的推崇，他們偏愛這種“美式和平”多過於不確定的“日式和平”或“中式和平”。

隨著“雙重冷戰”的結束，**中國**不再擔心蘇聯的霸權與威脅的意圖，處於進行經濟現代化戰略的更佳地位。但從1840年到1949年在外國列強手中所**遭受到的凌辱**，以及在兩極時期承受兩個超級大國威脅水平，深刻地劃定了他的對外關係，特別是與大國的關係。另一方面，**中國的安全政策越來越多地集中在美國的亞洲政策上**，北京認為這個國家在實行霸權戰略。中國的擔心並非僅僅由美國的軍事能力而產生，美國強調的經濟自由化、人權以及民主價值在中國被視作具有顛覆性，並且比任何軍事威脅在短期內更危險。重要的是，**中國是一個不滿足於自己現在地位和作用的強國**。這使它對於現行秩序成為一個“**修正主義強國**”。

不管由於其抵制的“西方價值”的意願也好，還出於古老的霸權的喜好，中華人民共和國越來越多地展現出作為在地區現狀上不太感興趣的強國，儘管在這個過渡期內它在一種由地區強國控制的平衡制度與恢復以中國為中心模式的相當大的困難之間猶豫不決。這樣，除了強調經濟發展之外，**北京採取了使其常規軍事力量和核軍事力量現代化的政策**，認為對中國保護其利益和國家意圖是絕對根本性的。儘管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世界最大的軍隊(參見附件2，東亞軍事編制人數)，但展現出相對於美國武裝部隊技術落後三或四代——其現代化給予他最大的力量規劃能力。這就是中國在**與俄羅斯的戰略伙伴關係**中在同樣向著建立起一種可能的、反西方聯盟威脅的政治戰略上最主要的興趣。事實上，中國對俄羅斯軍事高科技的接軌可以快速地影響整個地區的力量平衡。但要到了其常規軍事力量

獲得料想的現代化水平的時候，核武器對中國來說還是代表著一個大“均衡器”。在其他的理由中間，“中國威脅論”仍壓在亞太地區之上，因為實際上不可能預測其未來的行為：如同我們在前面看到的，中國成為地區安全和穩定最大的未知數。

日本也為自己在新秩序中尋求一個嶄新的地位。隨著冷戰的結束，他不僅失去了其在抑制東北亞共產主義之中美國高級“航空母艦”特點的意義，而且其傳統政治——基於經濟國內化的“吉田政治”和在政治戰略問題上的“低調”——表現出對日本新政治野心的不足和不相稱。東京尋求其經濟和技術能力與同樣決定性的政治作用、並可能為該地區領導的平衡——這一點的證據是其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成員的這個有限團體的野心。另一方面，與他的盟國暨保護者美國的貿易控訴頻繁，美國軍事力量在沖繩的存在將被周期性地爭論下去。而且東京與華盛頓之間關於分擔日本領土上的美國軍事設備的花費的誤會很明顯。總之，日本的“正常化”——例如，在其武裝部隊承擔起該國國防的重要部份——被其餘亞洲人看作為向著他們過去了解清楚並害怕的日本帝國主義強國前進的一步。事實是這個島上民族仍是個受限制的強國，而且如果不承受大的政治代價，不可能期待在安全問題方面作為一個獨立演員。必然，日本的作用及其在力量新平衡中的地位與美國留給他的緊密相關。回想起還有其他對於展示日本安全和防衛根本性要素：未擁有核武器，日本面對著俄羅斯與中國兩個核強國，還有朝鮮核武器化的可能；與他所有的鄰國都有分歧（庫里爾群島

(1) 隨著 1999 年 4 月柬埔寨的加入，東南亞國家聯盟終於使所有的東南亞國家成為一體，使一個於 1995 年從越南、老撾和緬甸開始擴展的雄心勃勃的計劃達到高潮。重要的是，如果我們還記得在從它成立（1967 年 8 月 28 日）差不多三十年以來，只有一個國家——汶萊，在 1984 年——加入到五個奠基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之中。這種快速的擴張是對東南亞國家聯盟在其經濟發展和在地區與國際領域極為信任的反映。

問題上與俄羅斯，竹島問題上與韓國，尖閣 / 釣魚台問題上與中國和台灣），這意味著他不確定的邊界劃分；緊靠著朝鮮和台灣兩個非常緊張的地區（正巧是他以前的兩個殖民地）；而且還有關注其在中國海航海自由行動的理由（我們不要忘記日本是一個極度依靠海路的群島）。

東南亞國家在這場大國間的賭博中沾了一點邊。儘管對一種創造冷戰能力的疑惑符合戰略新限制，**東南亞國家聯盟**作為一個突起的地區組織從冷戰中出現。那些最早的成果對滋養強烈的期待做出了貢獻：創建一個自由貿易區的決定；在其成員之間及在東盟與地區、國際其他伙伴間貿易交流重大增加；通過東南亞國家聯盟地區論壇，該團體開創了一個在那時難以想像的關於亞太安全問題的多邊對話，成功地在其他國家中聚起了美國、俄羅斯、中國和日本；1995 年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的完成；在此期間，作為歐亞之間政治、經濟、戰略問題辯論論壇的亞歐會議（ASEM）成立，從中代表著作為美國——歐洲——亞洲三角形的第三方；增加至所有的東南亞國家⁽¹⁾。這種卓越的外交能力為其“開放地區主義”特別形式開始作為在國際合作中其他經驗的范例作出貢獻。而且在幾個世紀的外界控制和干預之後，東南亞國家聯盟所達到的聲譽可以預知他將會是一個決定性的演員，並且在東南亞新秩序中自主。

然而，最近幾年當面對某些挑戰時，東南亞國家聯盟出了錯：對於減輕 1997—98 年經濟金融嚴重危機的努

力不足；最主要的成員印度尼西亞陷入了危險的政治與社會的不穩定，有拆毀整個國家的危險；並且在參與東帝汶發展中缺乏熱情。另一方面，領土的爭議以及成員國間的相互不信任阻礙了東南亞國家聯盟內部關係的更加深入以及東南亞安全團體的發展：這裡，**雙邊關係的緊張抵制地區一體化**。加上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間存在**對於中國的不同感覺**，這使得整個團體一齊面對其巨大且強大的鄰國在南中國海，即有關斯普拉特利群島和帕拉塞爾群島方面的任務變得更為複雜——只要對比一下例如印度尼西亞與緬甸同北京之間存在的關係種類即可。作為彌補，在該地區的某些國家中滋長了美國是一個對東南亞安全、穩定和發展越來越根本的堅信。如果本身不消極的話，這讓擁有較為有限關係的其他成員與華盛頓及其他加強有限泛亞對話的捍衛者很尷尬。同時，除了中國和美國，**澳大利亞也尋求被確認為強國並且擴大其影響**。這一行為不僅在其南太平洋影響的傳統區域，而且也對東南亞。在東帝汶，其作用和介入很明顯。

很長時間裡，在看起來可以使不干涉其成員內部事務的宗旨同更大的地區一體化目標，以及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起更為啟示作用的機會調和的情況下，東南亞國家聯盟擁有世界主要強國的支持和承認。儘管如此，一旦重新確認其不干涉內部事務，東南亞國家聯盟解決不了在其本身的成員間的分歧，而且顯示出無力構建出一個真正的安全集體。於是，面對主要是源於中國和美國，但也有源於澳大利亞的壓力，它在地區秩序和在力量新平衡中的作用顯現出減弱的情況。

由於在亞洲強國間沒有一種天然的平衡，也沒有在地區的國家間確定的等級，關於力量新平衡結構的不確定持續著。作為唯一剩下的超級大國，美國明顯統治和領導著新秩序，但或許沒有條件來阻止地區平衡中的重大變動，而且還沒有表現出可以確保維護現狀的能力。並且，如果沒有不可缺少的多邊官員來構建戰略上的相互影響，或至少遏制衝突升級的危險和對抗可能發生惡化的危險，各國的自然傾向使得他們所有的和每一個以一種並不排除攻擊傾向的競爭邏輯集中在其安全和國內利益的鞏固上。這種攻擊傾向可以在各自的軍事武器裝備的加速現代化計劃中得到證實。

地區的分歧與紛爭

另外一個突出新秩序在亞太的無法預見性以及表現出安全傳統困境存在的因素，是有眾多的紛爭與分歧要去解決的主導。事實是，世界兩極政治的結束使置於地區爭執之上最大的“窒息”因素消失。無論如何，在東亞保持著某些與傳統對手及與歷史分歧共存的冷戰傷痕。

朝鮮的分割到冷戰結束仍未解決，直到今天對峙的危險在三八線的雙方之間持續著。事實是，在最近幾年該半島上出現了重大的進展。從1991年南、北朝鮮進入聯合國到四方會談（南、北朝鮮、中國和美國）開始，經歷了1994年的框架協議（在對朝鮮

核武器化威脅的複雜商討過程之後），以及1995年朝鮮能源發展組織的創建。當諾貝爾和平獎韓國的金大中和朝鮮的金正日（金日成的兒子和政治接班人）於2000年6月初在平壤會晤的時候，五十年來積累的緊張讓位給了一種未來和好的夢想。這些期待並沒有產生失敗的結果，而且在短時期內朝鮮雙方同意通過非軍事區（DMZ）重新建立通道、公路和鐵路，決定在板門店（位於非軍事區內的城市，1953年在那裡簽訂了結束朝鮮戰爭的停戰書）重新設立聯絡處。與此同時，進行著約50年前分離家庭間象徵性的訪問。不久，在悉尼奧運會中，他們的運動員在同一面旗幟下列隊行進。這些首創意義重大並且揭示著一種地區外交的變化：自從1950年朝鮮戰爭開始以來，漢城和平壤第一次——比華盛頓、莫斯科和北京更多地——尋求領導該半島內的事件。

然而，除了出現的象徵性和意義重大的進展，儘管朝鮮的和好作為定期目標被南、北朝鮮也好，鄰近大國也好，不斷地重新肯定；但這**是一項遠較例如德國統一更複雜的事業**。因此，**就連一份和平條約還沒簽訂**，雙方間武裝鬥爭的潛在危機仍很高，如三八線附近高水準的巡邏以及軍事佈署可以為證。然後，**南、北朝鮮間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差異極其重大**，這遠比例如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RDA）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RFA）之間的更大。這意味著雙方之間在信任、親密關係的創建和鞏固上還有一段長路要走。例如，有人質疑在1993—94年的“核冒險”之後，平壤最近的企圖主要在於引發漢城與華盛頓間聯盟團結的破壞，吸引國

際社會更大的注意與尊敬，並且導致美國與韓國方面本身“減少警戒”。另一方面，這個過程不能指望歐盟和北約組織在歐洲作用於德國的“靠墊”模式；只是因為在東北亞不存在這種組織，而且對此進程感興趣並更顯要的強國（如美國和中國，以及日本與俄羅斯）也沒有一種類似歐洲安全和合作組織的機構，可以就其自身之間安全問題進行對話與合作。根本上，朝鮮的主要困境是它處在大國戰略地理特殊且危險的匯合點上；大國以極為自身的觀點和利益對待該半島，並且總是以朝鮮卷入其戰略遊戲而告終。該半島核武器化的可能性以及北朝鮮明顯的衰弱確保了朝鮮問題的一種另外的國際規模。於是，即使形勢現今更積極，它仍舊繼續對地區平衡構成極度的復雜和危險。

眾多構成被分隔的偉大民族的國家實體中，台灣處於一種不太令人羨慕的地位，因為在兩個中國（原文如此）間的不平衡真的很離奇：一個3萬6千平方公里、謹慎的島中國（台灣）對著一個人口眾多、近100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略多於2千1百萬、國家化的島上中國人對13億人民中國的自己的同胞。或者說，台灣有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2%的人口，面積為他的260分之一。也存在著一種相當大的“外交不一致”：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大約130個國家所承認，並且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1971年10月25日，在其第26屆大會中，聯合國大會通過了2758號決議，將中國的代表權給予北京政府，代替並驅逐中華民國——台灣）；台北除了與約“三十”個國家以

外，沒有保持外交關係，而且未在聯合國成員之列。所以，**國家化是一種“空想狀態”**，國際社會的驅逐、對其排斥是如此地反常，就像1971年之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樣。巧的是，或也許不是，**經濟效力與人口發展指數的統計對比表現出台灣使人順從的優勢**。通常以一種雙重有利情況解釋50年代的“衝刺”：數量眾多逃難的中國幹部和技術人員在台灣，以及美國的有力援助。

70年代初自從美國打了“中國牌”以來更加地“邊緣化”，台北政府在面對北京的國際佈局中從來沒有停止尋求肯定其身份，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力量和影響逐漸限制了台灣的參與及讓自己在國際上，即聯合國為人所聞。然而，不管或多或少嚴重的周期性危機，近年來可以看到海峽兩岸間貿易交流的重大增長，以及一些雙方間**非官方接觸的進展**。也就是通過如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SEF）和中方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ARATS）的中間組織。

儘管如此，要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之間存在共同利益**，這些利益也不太多。並且僅僅基於同一個文化集體、共同利益中發展經濟貿易交流，明顯分擔重新統一中國的意願。然而，**不同點很多而且很大**：

- 對於北京，僅存在一個中國，由共產主義政府代表，而不是台北，它無非是一個“反叛省”的地方政府；對於台灣，任何談判先決條件要承認一個事實——一個被分隔的民族，兩個實體，也就是，一個被分隔的中國由兩個“相等”政府所領導。

(2) 兩個微小的多岩石島（8至12公頃），位於離韓國東海岸約250公里，與烏爾金（東經131°52'，北緯37°14'）同緯度，它們於1905年朝鮮大幅衰弱的時代被日本吞并——朝鮮自己也在5年後被日本吞并。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不得不放棄朝鮮，但竹島的情況從未被澄清。早在朝鮮戰爭開始之後，美國軍隊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試圖以一條經過離朝鮮海岸約200海里的線（麥克阿瑟線）來裁判日本和朝鮮海區的劃分。儘管如此，那時與日本進行著談判的漢城政府決定了在1952年1月18日宣布其對整個地區完全的主權，在此之中“和平線”出了名。東京抗議，談判被凍結了。這並沒有妨礙之後的協議（1965年和1974年），儘管這樣從未解決竹島問題，以及兩者間的邊界劃定。東京到了建議將此問題交付海牙國際法庭，但漢城拒絕了。

· 鄧小平“一國兩制”的中國方式，台北反之以據國父孫逸仙“三民主義”為基礎的“一個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國”。

· 總之，即使雙方表示出和平方式統一的偏好，北京也不排斥在“台灣宣佈獨立或外國干涉”的情況下使用武力，實施“三個保持政策”：保持與台灣的經濟關係，保持對該島的軍事壓力和保持外交封鎖。另一面，對於台北，統一還是一個遙遠的目標需要經歷許多階段才能實現：交流與相互關係，相互信任與合作，通過平等談判的統一。

所以，關於該島地位的政治爭議仍沒有解決，北京毫不猶豫地一再強調準備好使用武力來促使台灣進入“大中國”，如於1995—96年及1999—2000年台灣大選前夕在個海峽進行威脅性的軍事演習。不穩定和危險的情況很明顯，也越來越多地與中美關係相連接。

除了這兩個較大的、對地區和國際安全與穩定較危險的潛在“緊張”，其他在東北亞的主要爭議使日本卷入，這樣他自己仍有著未確定的邊界。北面，東京面對著俄羅斯要求收復一組在庫里爾群島中的小島。使用於1951年在舊金山放棄庫里爾各島之時的論點來支持，不包括位於烏魯普島以南的島嶼——也就是齒舞、色丹、國后和擇捉各島——既然在他看來，這些島嶼從未構成庫里爾群島的一部份，而之前是其北海道島的延伸，因此是其“北方領土”（論點和講法是在1960年代初才真實穩固地出現）。莫斯科這方面認為由蘇聯在1945年佔領的庫里爾群島，以及1951年日本在簽訂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所有各方面前同樣正式放棄它們——簽署人既不是蘇聯也不是俄羅斯——包括像這樣成為其“南庫里爾”的島嶼。這種爭執，與冷戰情況密切相關以及從19世紀末以來俄日令人不安的關係的活生生的證明。隨著美國（他在舊金山和約中的模稜兩可負有明顯的責任）保持等距離，爭執持續存在並妨礙雙方之間關係的重大改善。雖然此時此刻不是真正的緊張焦點，但是是一種不和。由於卷入地區強國與歷史對手，它的發展必需伴之以全部的注意力。

往西，日本人與韓國人爭論**竹島 / 獨島**⁽²⁾的主權。毫無疑問，被視作為一個較小的爭端，但依舊成為在日本新野心與保持著深深反感、對其鄰國的渴望不信任的韓國間關係中的一根“刺”。最後，在西南方面，日本察覺到**尖閣島（中文為釣魚台）**的佔有被北京和台北所反對⁽³⁾。儘管有偶爾的小衝突，但也不能認為是一個大的緊張焦點。然而，由於妨礙了日本與中國海界的劃定（兩者都想把該地區包括在其主權之內），是一個可能變嚴重的問題。並且由於將兩個傳統敵對強國放在面對面，而且他們在該地區有著或多或少的霸權野心。這些島嶼除了相對戰略重要性，擁有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氣儲備，很明顯是任何人都不想放手的，為什麼是一個雙方經常性機械化的爭執就能理解了。加上問題不光是雙邊的，鑒於直接與台灣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來表示所有牽涉台灣的事都與他有關）以及也與美國有關，因為美日安全條約第五條聯合了美國人來保衛“任何在日本治理下的國土”——從美國1972年將尖閣島歸還日本以來，它確實處於日本治理之下。

(3) 中國的主權要求只是在1960年代末才出現——直到那時北京和台北編制的地圖冊認為尖閣島是日本的——面對那里存在能量資源的可能性，以及面對宣布了的琉球管治（行政上包括尖閣島並從大戰以來處於美國管治之下）由美國歸還給日本。對於東京，當1895年1月14日正式吞并它們時，尖閣島曾是“無主之地”，於是與吞并台灣無關。台灣是在中日戰爭以及隨後1895年4月下關條約的一個系列。在中國看來，尖閣島在15世紀從明朝以來就成為中國的部份，這摧毀了日本的論點。根據下關條約第2條，滿清政府被迫割讓台灣及其鄰近島嶼——對於中國人來說，尖閣島在其之中、而且日本應該歸還它們，就像太平洋戰爭之後對台灣所做的一樣。

最後，還有在東北亞，有待於解決在黃海的海界和邊界的劃定，這涉及四個國家的問題：中國、朝鮮、韓國和日本。

在東南亞，除了許多位於那裡的國家的一些內部問題，根本上源於種族—信仰和 / 或分裂 / 自主政治。繼續存在著領土爭議（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汶萊和泰國的關係）和歷史反感與不信任（泰國—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越南、汶萊—馬來西亞、汶萊—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儘管這些問題該值得我們關注以及仔細的觀察，但並沒有類似於其他兩個問題的潛在嚴重性。一方面對地區穩定更成問題的可以表現在印度尼西亞的政治分離主義及社會經濟的動蕩上。面對突出而且持久的經濟危機，而且還陷入蘇哈托之後的政治過渡之中，印度尼西亞（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國家，人口約2億2千5百萬，東南亞國家聯盟有力的領導）冒著內破裂和毀壞的危險。在為保持非法吞并東帝汶的鬥爭之後，雅加達面對著嚴重的分離主義緊張關係，即在蘇門答臘的亞齊以及巴布亞島的伊里安查雅，與社會動蕩（大部份由經濟困難引起）加劇的同時，出現種族間以及信仰間的矛盾。而且爭端與政治不穩定持續，正如亞伯杜拉罕·瓦希德的罷免以及梅加瓦蒂·蘇加諾升作總統那樣明顯。事實上，情況對東南亞的穩定很緊張並且令人高度擔憂，因為它的惡化會退化成為更大規模的內部糾紛並甚至脫變成國家的毀壞，連同由“驚浪”作用對該地區可以預見的後果。

但如果印度尼西亞的問題根本上是國內的，儘管帶有地區後果，**南中國海**問題明顯地具有國際性質並卷入了不僅東南亞國家——越南、菲律賓、汶萊、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也卷入了中國和台灣。因此，**在那個地區**存在著**海界劃分的問題**以及各自主權和專屬經濟區領域的問題，這就其本身，與資源的開發以及航行自由（例如，日本沒有領土權力，但表現出相當擔憂因為其貿易的大部份，即其 75% 的石油進口通過南中國海）。

另一方面，有著關於**斯普拉特利群島**（中文為南沙群島，越南語為長沙群島）以及**帕拉塞爾群島**（中文為西沙群島，越南語為黃沙群島）的爭執。這些群島周圍水域幾個世紀以來主要為中國和越南的漁民航行，但也有馬來西亞、爪哇和其他的漁民。每個國家根據在那裡找到的歷史“證明”來要求主權。稍後來了歐洲和日本殖民者，論理的比賽變得更加複雜。**關於帕拉塞爾群島**的分歧僅卷入了越南和中國。在從法國殖民那裡繼承這些島嶼之後，越南人目睹了 1974 年，西貢制度倒台的前一年，共產黨中國武裝佔領整個帕拉塞爾群島。河內認為那是“一種磋商過的侵略”。越南直到今天仍要求恢復其對該群島的權力。

同樣的各方保持著另一個對領海與在 Tonquin 灣各自的海界爭執。越南辯稱同中國的領海界線的合法性在於 1886 年法中文本之中（由 1887 年一系列協議所補足）。它明確了位於巴黎子午線（東經 105° 43'）

以東的島嶼屬中國而位於它以西的屬越南。中國政府就其本身反駁了1886—1887協議越南的理解，推算關於島嶼主權的分隔線沒有確定領海界線劃定。

此刻關於斯普拉特利群島，情況遠更複雜，隨著所有設在靠河國家（中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台灣）在取得那個群島的島嶼和礁石的實際佔有權，目的在於確定權力要求，形成一種紮根的名副其實的拼花圖樣：汶萊是一個例外，儘管他保持著自己的權力要求。在爭論地區一旦將石油開發特權賜予該地區“外”強國（美、日、俄等）的公司和財團，當地政府就尋求確認其更多一點的主權，並使國際社會對問題感興趣。但事實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目睹著來自中國方面對該群島極大的壓力：1988年將越南人從7個環礁（Johnson Reef）驅逐；1992年2月頒佈了其“領海法”，其中闡述其對整個帕拉塞爾和斯普拉特利群島及鄰近水域的權力要求，保留使用武力的權利如果其主權未被尊重（東南亞國家聯盟以“南中國海宣言”來回應，提倡以和平和不使用武力的方式克制紛爭）；1994年，北京冒了新一步的險，首次在一座明顯在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主權之下的島上設立平台（Mischief Reef）。對於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們多邊談判的建議，中國偏向於雙邊談判，對於每一個由於政治軍事不成比例的小國來說顯然處於不利地位。最後，中國“提供”共同開發資源，但要在承認其主權之後！對所有這種混亂而且危險的情況，瞬間增長起了所有國家，特別是中國，發展其海事和空中手段的能力來長久

地規劃其影響和干預力量的事實。毫無疑問，一定期限內南中國海主權問題可以引發一個更大的紛爭。

潛在的軍備競賽

近十年來，媒體一直提到亞太地區的“軍備競賽”。然而事實是該地區的大部份國家關於其軍事力量，國防上的收獲和支出是相當“保守的”：例如，分析家們一直在討論中國在國防上的實際支出，以及北京的官方數據事實上應增加多少倍。儘管那些證據比較複雜并且因研究機構不同而變化，但相對而言這些材料的動態已經被很好地研究過了。該現象的那些具有說明性的範例指出：要在“軍備競賽”方面必須具備4個基本特點：

- 1. 存在兩個或以上派別，意識到其對抗作用。
- 2. 不論在戰鬥還是在勸誡編製人數上，武裝力量的構架都能考慮到其他參與者可能擁有的武力。
- 3. 必須在數量上（人數或武器）及質量上（人數、武器、體系、理論、適當的技術）上進行競爭。
- 4. 必須在“數量上”及“質量”的改善上展現出快速及重大的增長。

這樣，亞太地區的軍備競賽就真正地存在了嗎？該地區軍備獲取上的競爭從1980年代末以來，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儘管這種競爭實際存在，但從未有過一種實際上的“軍備競賽”。事實上，如果縱觀東亞軍事力量的現代化，僅憑其內部國與國之間的

互相對峙，我們並不能證實這整個過程。然而，確實和全世界一樣，在該地區，軍事力量也起著許多不同的作用，撇開參與“軍備競賽”不談，它的現代化也可以有其他的理由：保衛及控制其專屬經濟區的必要，在有爭議的海陸領域鞏固地位，尋求新的國際地位，擔心潛在的威脅，保持公共秩序，增強軍隊對既定制度支持的需要，滿足重組和完善武器裝備系統的意圖等等。

事實是，實質上缺少主要的催化劑來激發大型的軍備競賽。首先，在多方之間不存在一種明顯的敵對情緒——某些國家的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害怕由一種可能是共同維持安全和穩定的意願而減輕。其次，也不存在一種“力量空虛”，加速爭議來填補它——事實上，美國就是一位“地區平衡者”，並以此而聞名。目前，就算是修正主義的中國也不能向美國在軍事上的優勢挑戰。於是廣義上，理論及政治、軍事戰略也具有防禦的本質。這樣，也可以證明：儘管國防上的總預算和人均花費已經提升（兩個最大的例外自然是美國和俄羅斯），而在最近十五年內，國內生產總值用於國防上的百分比及軍事編製人數卻越來越低（參見附件1和2）

即使如此，在軍事裝備競爭同樣水平上，出於諸多的傳統敵意、爭鬥，有待於解決的分歧、衝突、爭執，相互不信任以及各大國表現出來的更新的野心，都使得東亞局勢仍很危險。處於幾乎受限制的形勢，其中任何的不平衡——例如，俄羅斯的重現，美方

軍隊的撤退，日美同盟的削弱或是中國武裝系統重大的改進所引發——都能促使軍事武裝戰鬥力的競賽。同樣，緊張和紛爭的加劇和升級，尤其是台灣海峽，朝鮮，南中國海，都會導致這場競賽。自然而然，各強國之間關係的日趨惡化及敵意的出現，尤其是中美之間，將會成為促使這種升級的決定性催化劑並變得難以控制，直到現在潛在的“軍備競賽”。這些都增加了該地區不安全的氣氛。

東亞安全和穩定的根本性決定因素

如果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導致滋養東亞地區不穩定和不安全的氣氛，使新秩序更加易發揮而且難以預測，那麼中國和美國的政策、戰略及根本上各自及互相定位的進展將成為決定整個東亞命運的重大決定因素。

美國的困境

幾乎一致同意，冷戰的結束被認為是美國和西方價值觀的重大勝利。進半個世紀的抑制戰略贏得了在精神上反對共產主義的目標及抵制蘇聯擴張的政治地理任務。於是，出現了一場有關在冷戰後時期美國作用的本質的激烈討論。基本上，對於美國在“新秩序”中合適的策略問題，展現了四種前景：

明顯的“逃避者”或新孤立主義者，“勝利者”或“優先權”的前景，源於“選擇委托”或“選擇約定”實用主義的原理的“可選擇”前景以及“合作安全”的擁護者或維護者的整體。正當理論家們討論美國的作用時，美國領導人於本世紀第三次發表了其想要創造一個世界新秩序的意圖，旨在向全世界推行它的原則和價值觀，將國際體系按其意願重新規化。為了保證這種“新秩序”和維護他的利益，美國的政治策略規化者們一直尋求一種旨在保持美國“無處不在”以及旨在貫徹其以“協定”和“擴展”概念為基礎的新偽教條的好的解決辦法。在亞太，美國人所尋求創造的這種“新秩序”本質上是對“世界新秩序”的一種區域性說法：一個多邊的大論壇，有能力提出形成共存規則，涵概從經濟貿易自由，人權維護到安全問題及地區衝突的討論。這種秩序由美國和一些地區大國聯合監督與保證。

冷戰的結束和東亞的傑出表現提高了該地區對美國而言在經濟地理和戰略地理上的重要性。隨著美國和太平洋彼岸的國家之間關係結構上和機能上重大轉變，與太平洋彼岸的聯繫和關係的緊張成為了與亞洲國家利益衝突和矛盾的重大根源。但是華盛頓在該地區仍保持著和以前一致的根本利益：避免任何一個國家和任何一個國家的組織單獨在政治或軍事上控制亞洲和太平洋，因為對海運交往的自由使用是根本性的，保持美國自由獲取原材料及進入該地區的市場，提高它的競爭力，保持了盟國和友好國家安全上的支持，鼓勵了民主自由、自主和尊重人權的制度的發展。

美國在該地區維持著它的霸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是**安全和穩定的主要保障者**，而這便是軍事出現和兩極時期策劃的聯盟機制的成果。然而，它的領導地位將日益遭到反對，而且一個像美國一樣的超級大國，也很難抑制地區強國——日本和中國的野心。於是，**問題便是如何確定一條合理的策略**，使華盛頓可以策劃和領導這種秩序，使之符合亞洲國家諸多不同（有時是背道而馳）的利益。事實是，無條理、不穩固、易變與遲疑是可以用來描述近十年來美國和亞太地區關係的最好形容詞。這的確應歸因於該地區的特殊和易變，然而更應歸因華盛頓所面對的諸多困境，尤其是關於如何管理其優先權，其在該地區在當地的作用以及與以中國為首的亞洲主要強國的關係。

這樣，在這些最重大的困境中，我們可以從**美國對外政策中缺乏一種一致、支持的概念**談起——如冷戰中的抑制政策。且看，這可以造成兩種類型的結果。正因為如此，使得優先權的形成及要達到目標的明確變得更困難，致使美國本身社會內部達成一致的游說更為複雜，增添了路線上的猶豫、不穩定和變化。另一方面，這種困境使得行動的理解、美國的初衷和真正意圖變得更加複雜。對其它顯得不夠謹慎的政府而言，這便可以導致誤解及華盛頓執行其政策的困難。

出現了與此個問題密切相連的另一個有關**美國在該地區利益和其全球利益相衝突**的困境。在諸如人權、民主價值經濟貿易自由此類的事務上，美方在亞太地區所實行的政策常常是和他的全球政策相背離的。且看，

當美國更關注他的地區目標時，其全球渴望就會受到損害。自然地，在他企圖實現其的全球計劃時，其的地區政策也會受到影響。

同一路線上，存在著關於美國在該地區政治地理和經濟地理作用間有問題的管理。這個問題經常表現在優先權的定義上，然而卻不單單如此。事實上，美國是亞太地區穩定和安全的主要保護者，而該地區卻同時也在持續抵制著某些政治經濟自由的價值觀，並且存在一些美國主要的經濟競爭者。

第四個困境在於是否要保持“舊金山體系”。這個問題由超越冷戰的束縛和對共產主義抑制的需要而產生。由於亞洲發生的巨大變化及大部份美國公眾的意見已不贊成美國仍負擔一個地區與之本身進行“不忠實”競爭的國家安全的包袱，許多人認為這種體系已經走到了其有效期的盡頭。在維持著其聯盟機構結構和雙邊協定的基本關係下，美國越來越堅持多邊關係的合作和對話，作為雙邊協定與聯盟以及美國單邊關係的補充，舊金山體系在輪廓未經明確定義的情況下，進入了轉變階段。

這同樣又和另一個有關美國可以通過哪些方式來更效、有成果地達成或促進其目標和利益的困境有關。或者說，運用手段及單邊或雙邊的外交，美國冒著破壞已經很脆弱的地區合作機制，而地區化和多邊化作為集體政治的產物和結果，可以有力地限制自治活動的“演習場所”，可能對國內利益的繼續會更合適。

第六個困境與美國和地區強國之間的關係以及華盛頓將對其起何種作用有關。其中最主要的則與中國相關：美國應該冒著嚴重損害兩國關係的危險來抑制和抵制其地區稱霸的努力，或是推動一種戰略夥伴關係或分享領導權來滿足北京的野心嗎？應該激起其政治自由主義，擾亂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來引發大膽的改革，或是在該國經濟前進前與之競爭，獲取分割巨大的中國市場的極大可能性，期望這以一定期限，導致重大的政治進展？另一方面，日本的作用可以發展到何限度？對俄羅斯該做什麼？華盛頓是否應該介入東南亞的衝突，尤其是有關中國的南海問題？本質上，這個困惑在於美國想給以中國和日本為首的其他地區強國預留的作用上。只有一件事是明確的：為了阻止任何亞洲強國稱霸的企圖，美國什麼都會做。

最後，綜合來講，美國的巨大困境在於他在太平洋地區新秩序的地位和想起的作用。加強他的霸權會導致以中國為首的地區強國的反應，從而勢得其反。但是後退及為那些地區強國留下更多的空間來滿足其野心，同樣也是危險的，因為這確實會促使地區間的競爭，尤其是為了佔據這個“力量空虛”的中日競爭。這難道就是華盛頓資助和領導任何一個安全合作方案或力量平衡方案的目的嗎？試圖推動和領導眾說紛紜的美國—日本—中國三角關係協定，或者將其擴大到俄羅斯？或是他的目的是通過一種包括朝鮮、東南亞國家聯盟和澳大利亞在內的更拓展的方案擴散力量先保持某種霸權？美國人有這種權威、地位和能力來實現他們的目的嗎？

這樣，對於美國而言這場大挑戰是一場超越其政治上的遲鈍和不連貫，並找到更為合適的機製來促進其利益，而這一切是不再能在專一的單邊視野中被發覺。美國在該地區的地位，地區安全也有很大可能起決於這些過程的經營。亞太地區在21世紀世界事務中的重要性也起決於華盛頓的政治戰略靈活性。

中國——帝國還是帝國主義？

兩極秩序的結束給中國帶來了明顯的後果。因此，蘇聯的崩潰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的重新佈局**：蘇聯包圍的結束（以前從 Vladivostok 到河內，經過 Cabul 和新德里）以及其與俄羅斯關係的正常化鞏固了中國的戰略安全，並將新重點賦予重新沿著向南和向海上空間的中國戰略利益。儘管如此，這就有著與他在該地區鄰國新問題的出現作為直接後果，**因為他們害怕“大中國”的野心**表現出尋求一種會破壞他們利益和主權的統治權。另一方面，由於他在華盛頓—莫斯科—北京三角方面以及全球力量權衡中的作用失去意義，中國將地區舞台作為穩定空間重新評價，從那裡可以鞏固其作為世界新秩序的一個大國地位。所以，人們目睹了一個真正的“**重新亞洲化**”的中國。冷戰後新時代裡，中國重新介入地區以及其在國際舞台的穩定，同樣經歷著更加依靠他**在全球和地區市場中一體化**以及其大膽的改革政策的成功，這在共產黨的政治控制下得以進行。從那以後，其與日本、美國及其他鄰國的貿易關係重要性增加，而且他與台灣和整個海外中

國人團體的關係也有增長。但如果這開啟對中國增長與穩定的唯一機會，同樣也把北京的政治當局放到了新爭端面前，尤其是因為市場活躍與專制的政治制度的共同存在。

中國是個在其地區歷史上傑出的國家，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如此認為的。但自從19世紀鴉片戰爭以及所謂的“不平等條約”以武力打開了該國以來，地位平等和不屈服於外來規定的強烈抵制對中國領導來說是一種道德驅使和一種歷史意圖。且看，**北京表現出對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霸權的一系列擔憂**，認為後者可以成為其安全和利益的威脅，因為從那時起美國質疑他正成為競爭和干涉的新目標。另一方面，與美國政治關係親密的日本，其更新的野心是北京擔憂的補充原因。

冷戰的結束也突出了中國政治的民族主義特點。現如今，共產主義在中國遠非是一個目標，而是一種與民族主義一起保持權威和秩序的手段，尤其是在政策領導方面：其目的及其政策更多地與考慮國家利益的保護以及中國的歷史意圖是什麼相關，而不是共產主義擴張的唯意志論或國際社會主義團結一致的反映。這種傾向總在人民中國的歷史上被表達出來，而在最近幾年被強調。這是一項其伙伴、競爭者或對手在與北京結交中一定要考慮的根本事實。

如果我們關注在最近十年裡**中國的姿態**，我們也許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其政策表現出一種矛盾的“**雙重人格**”，使更積極、更調和及更穩定的態度和政

策——從俄羅斯開始，與前蘇聯各繼任國疆界爭執決議，在解決糾紛（柬埔寨）和紛爭（朝鮮對國際原子能機構與美國）中的合作，加入亞太經濟與合作組織及東南亞國家聯盟地區論壇，參加“朝鮮四方會談”，推動在其香港和澳門行政區內的和平過渡，等等——與另一種明顯更具攻擊性、更具擴張性而且危險的姿態相符合——重大的軍事現代化，對台灣及對南中國海的軍事壓力，在安全問題上抵制多邊化，反美辯論中的升級，在旨在控制純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協議上保持著缺口，等等。且看，這必然反映在對中國所進行的分析——參考它的“發達外交”、“武力外交”或“冷熱外交”——也反映在其他國家有關於中國的態度與政策上。這些態度和政策根據他們對北京目標的理解進行變化。

事實上，中國的進步和將來代表著亞太地區最大的未知數，理解中國是否構成對地區和世界安全與穩定的威脅這個任務變得複雜。“中國未知數”引發了兩大類問題：了解是否能避免其自身的崩潰，就像蘇聯發生的，以及其欲望是否會變成威脅其鄰國及地區安全的攻擊性帝國主義。有意思的是，由於北京政策特點的兩面性，可能找到可以使不同評價生效的理由。

對於持“中國臨近衰弱”的人來說，中國表現出一個在危機邊緣的國家的所有症狀：人口過剩和人口老齡化，帶來生產和資源分配的消極後果；權力鬥爭，政治人士更新，中國共產黨本身的領導間摩擦——關於經濟上中央控制該維持多少共產黨應該做出的讓步；政

治官僚階層與其餘來要求新作用和新權利的中國階層的決裂，這些作用和權利很多次與中共的政策相矛盾；推動同其制度傳統參數相反的思想和原則，即為“其餘中國”（如香港和澳門）的一體化，與外國的中國僑民及其他國家接軌；北京當局與有著對該制度保證感覺有力、很少過分遷就的壟斷部門的解放軍軍人間緊張的增加；北京在保持地方和地區精英服從上的困難——在確定各自權威及分配收入中的糾紛很多——以及解決較富的沿海省份與內地貧困落後地區的不和諧上的困難；廣大農民階層中的不滿；普遍腐敗；財政體系及財產再分配無效；增長的犯罪潮；以及確定國內政治導向的“思想體系真空”。對於這種前景，中國未來最可能的舞台就是一種1911年之後發生的“重奏”，即當地區“軍閥”將國家切成較小的大塊並統治它們的時候，對抗中央當局。這樣，問題就在於以可能最佳的方式預見這種崩潰並避免它引發國際危機。照這種觀點，使其影響降低的最佳方法必定是民主改革的進步。

作為補償，有許多不相信中國崩潰的分析家。承認中國的領導會偶然遇到巨大而且艱苦的挑戰，他們不相信中國的分裂會是其中之一，因為制度沒有、政黨也沒有因經濟改革而較為脆弱，由於在貪婪地擁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正當的新源泉方面沒有情結，並且面對參與共同身份的人口甚至可以使它成為一種手段。如果以歷史為例，可以說中國更傾向於統一而不是分裂——運用“軍閥”時期作為參照點來預言中國的崩潰是一個錯誤，因為他們相爭鬥來統

義價值為和平作出了貢獻——那麼，在這種意義上，中國的制度沒有將這些價值列入其政治清單是對和平的一種威脅。另一種經常被引述的證明與中國自有的歷史形象、追求成為亞洲的統治力量相關。很長時間裡，中國人把他們的文明看作世界的中心。傳統上，中國人不接受“韋斯特法利亞”國家主權平等的概念，儘管北京現今不斷地引用它，特別在與美國的關係中——國際關係包含在孔夫子精神之內，它在“不平等”中確定了一種表現。中國自己處於級別的頂端，其他人則作為“下屬”或“野蠻人”。中國在這種秩序中的作用是保持穩定，向鄰國收取貢品，並推動其文明。這種觀點的精神財富是在中國人中間很強的信仰，認為中國是亞洲自然且合適的領導。以這樣的預先準備，中華人民共和國偏向於制定一份政治日程並且尋求在不顧鄰國利益的情況下建立一種秩序，只考慮那是其利益和目標。最後，爭論著**所有大國是支配者，而一個強大的中國並不會不同**。如果中國達到了它尋求的強國水平，不久一定會成為類似19世紀的大不列顛，蘇聯，納粹德國，日本帝國主義或20世紀的美國的強國。這些國家的每一個運用了它最大的力量來建立一種霸權的明確方式，目的在於保護和促進其利益。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來認為作為大國的中國，會扮演不同的姿態。如果出現在該地區建立統治地位的機會，中國必定會利用它。

相反意義上，同樣可以舉出許多理由來證明中國對地區安全不是一種威脅。自此，中國希望一種穩定

的國際環境，允許他保持使其如此受益的經濟增長和政治威望的貿易和投資水平。這樣，為東亞的安全和穩定作貢獻是他的興趣，並且中國試圖以武力方式達成其目的的可能性減小。這種觀點同樣辯稱，**在歷史上，並且即使在其力量頂點，與歐洲人和日本人相比，中國表現出很少對土地擴張或徵服方面的努力。**對此事實普遍的解釋在於中國文化中：一方面，中國人相信外部世界是“下屬”和“野蠻人”而且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給他的；另一方面，也由於倫理學規範的指引，只是在極端且“正義”的情況下才使用武力。如果中國現在和未來的領導受這些歷史和文化遺產的影響，可以相信中國不會為了獲取利益而使用其權勢。第三，北京的領導堅持**其制度擁護和平**，既不會威脅其鄰國也不會強迫小國。中國以**拒絕“霸權主義”**及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與其他大國劃清界限而自豪。儘管很強大，中國仍是一個好心而且值得信賴的演員，一種和平力量而不是一部威攝的戰爭機器。第四，同樣也爭論**中國軍隊的結構調整和現代化是有限的、合情理的，而且沒有任何霸權企圖。**與其他國家的相比，從美國及“非軍事化”的日本開始，中國的軍事開支還並不高（1999年中國國防總預算 39,889 百萬美元，日本 40,383 百萬美元而美國則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283,096 百萬美元：參見附件 1），而用於國防的國民生產總值百分比也減少了（從 1985 年的 7.9% 到 1999 年的 5.4%：參見附件 1），軍事編制人員直線下降（從 1985 年的 390 萬人到 1999 年的 282 萬人：參見附件 2）。儘管如此，中國國防預算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因為

通貨膨脹、軍事行動開銷以及解決某些防區的需要，尤其是由於其部隊陳舊特徵。另一方面，軍事現代化沿著中國自身經濟增長的道路前進，更多地服務於國內政治——維持社會秩序，軍隊對制度的忠誠——而不是對外政策上邪惡陰暗的企圖。最後，一些人還推崇不存在中國威脅的根本原因在於這個強國的現實還沒有必備的能力來使地區力量平衡轉向有利於他並且豎立任何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

這樣，所表達出對中國的恐懼可理解為僅僅兩個動機：自此，因為擔憂和緊張總是緊接著一個新大國的出現，在這種情況中很正常但不公平；另一方面，因為其他國家害怕看到自己的力量和地位減弱，不容易接受一個新大國的出現並傾向於把它認作為對已建立起來的秩序的一種“威脅”。

一種關於要採取的對北京的正確政治態度的巨大困難是由關於中國前景不一致產生的：一旦在地區和國際社會推動中國一體化，其他國家希望可以從巨大的中國市場受益並且為北京以其他自由化的改革自我克制和前進；但一旦富有並與仍有權威的中國妥協，也加強了他的實力，增加了其威脅已建立秩序的途徑，如果他想要的話。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那樣如此直接地面對這種困境，他同時是中國最大的投資者之一，也是中國軍事威脅主要的目標。但一種類似的邏輯不但對美國和日本，也對東南亞較弱的鄰國起作用。歷史證明並非所有的強國表現出同樣的方式：例如美國二十世紀期間在美洲的姿態

與 1930 年代納粹德國在中歐的政治本質上是不同的。
中國也有自身的特點——只在了解是否其姿態是一種“好心強國”還是對地區安全構成威脅。直到現在，中國是一個真正的未知數。

結 論 和 建 議

從前面敘述之中，提取的第一個結論是，比起冷戰時代，亞太地區處在一種更積極的情況和更溫和的氛圍之中——尤其因為缺少了在大國間的公開矛盾，該地區國家間關係的誠懇改善以及經濟增長上的共同利益，團結的最大的因素和相互依賴的催化劑——事實是新秩序更易變、更難以預測。這個事實根本上由在該地區一種傳統安全困境的存在而發生，所以共同存在著：一個統治地位的前強國進入衰退並陷入混亂的過渡期——俄羅斯；一個處於重新評估其政治與戰略準備階段的霸權強國及領袖——美國；一個歷史上佔統治地位、現今對地位不滿的強國，於是是一個“修正主義”強國——中國；一個有能力、野心的強國，但復雜並附屬於“保護保證”——日本；面對直接與臨近的威脅，害怕失去支持並準備扭曲其個性的“較小”強國——南、

北朝鮮，台灣及大多數東南亞國家聯盟國家；處在崩潰、內破裂和毀壞危險中的強國——主要是印度尼西亞，但也包括朝鮮和中國；紛爭和分歧待解決——朝鮮，台灣，南庫里爾 / 北方領土，尖閣 / 釣魚台諸島，斯普拉特利群島和帕拉塞爾群島等等。未確定的邊境線，領土要求及處於爭執的主權地區；軍事能力及潛在武器裝備快速與重大的改善；以及缺乏安全體制或關於這些事務合作與對話的組織。事實上，在缺乏亞洲強國間自然平衡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國家間協商的傳統，而且外部的樹立平衡的強國沒有可能壓制該地區主要強國的渴望和野心，**有關力量分配的結構仍持續難以確定。**

該地區的穩定並非一項自然法則，但是一種越來越需要考慮和小心觀察的平衡的後果。所以，**東亞安全和穩定的維護要遵循一些根本性的決定因素：**

1. **美國戰略出現的持續**，對阻止亞洲主要強國間競爭的危險來說是**關鍵**。這個“外部”強國的確立平衡作用應被保持，因為他的變動將讓道路大開，使得正在發生的分裂原動力顯露，尤其是面對讓地區矛盾加深的“力量空虛”，中日兩極化的可能確實難以避免。
2. **美日同盟是地區安全的“基石”**。儘管是冷戰的產物而且國際和地區的情況已重大變動，其有效得到完全的證實：首先，是對日本武器裝備現代化根本性的貢獻，也是對擔憂的亞洲鄰國主要的保障；其次，也是日本自己安全和防衛的保障，他害怕中國的意圖而且受制於一系列使他地理界限和主權專屬

區不確定的紛爭和分歧；第三，這個同盟也與朝鮮和台灣本身的安全相關聯；最後，讓日本逐漸在新作用和更新的、他如此渴望的地位方面獲得新責任。出於明顯的政治地理和對地區穩定責無旁貸的益處，這種軸心在加速日本軍事化（可能發生核勸誡），催化該地區內軍備競賽以及挑動古老對抗的遺憾之下應被保持。於是東京和華盛頓應該繼續在相互商業競爭上增加這種重要的戰略地理關係中的保持之中所有人的利益。

3. 隨著中國政治指導中的民族主義，他成為了亞太地區命運很大的未知數。而他也是任何一種穩定國際秩序中主要及難以描述的合作夥伴。據此，除非中國的行為表現為對地區安全的一種實質威脅，對於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而言抑制他和孤立他不是一種合適的政策。因為還會更加刺激他已經很複雜的民族主義情緒，傷害他的自豪——相反地，應該實行一種與北京的合作協調關係。且看，這不能通過對該國提供僅僅遵循既定和預訂規則的機會，應該通過了解和承認中國的利益及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特殊性擁有一種主要意識。這種“協定”也可以通過使中國完全融入國際社會，邀請其合作制定國際條例，與之共同分擔在軍備控制制度中的領導責任，不擴大與解除軍備的責任。總之，承認中國一直要獲取的地位。然而，北京也應該知道如何得到這份信任，成為一個“值得信賴的強國”，於是要按那些既定的規則行動並承認其他國家的利益和價值。尤其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穩定的關係和良好的銜接對於亞太地區新秩序的穩定是至關重要的。

4. 安全和穩定對於住在太平洋沿岸的人們的發展是絕對至關重要的，這可以成為眾多國家節制表現的一個因素。所以，在該地區和每個個體經濟發展上的賭注應該成為這些國家的迫切問題，而且貿易交流和相互依存交流應該受到鼓勵。與穩定和經濟增長相關的共同利益應該超越分歧和敵意。
5. 東亞人民不太在意的是是否重複了過去的錯誤，最好的避免它的辦法是有條理地共同工作，來建設一種穩定的、經久的地區秩序。如果不存在或缺乏可以保障穩定和安全條件的平穩、多邊關係體制的手段，既然傾向於使競爭策略服從、減少傳統衝突、建立和平解決衝突的相互諒解的平臺，那麼**鼓勵多邊結構關係**便是必要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應在其成為真正安全團體意義上的更深一層，東南亞國家聯盟地區論壇應僅僅作為一個良好的開端看待，並持續下去。

經濟危機、領土爭執、歷史緊張以及各大國之間傳統的利益衝突都導致了許多東亞地區不安全感。這樣，日本和中國應該懂得協調地位和政策來領導地域版塊。在一種不排除其他諸如俄羅斯、朝鮮、東南亞國家聯盟及澳大利亞的“三極協調”原動力上，他們的策略應該同美國的一起互相鞏固。

路 易 斯 · 霍 爾 · 托 姆

附 件

附件 1 東亞國防的花費

(1999 年實際價格)

	百萬美元			人均美元			GNP 百分比		
	1985 年	1998 年	1999 年	1985 年	1998 年	1999 年	1985 年	1998 年	1999 年
澳大利亞	8,068	7,682	7,775	512	407	407	3.4	2.1	1.9
美國	382,548	279,702	283,096	1,599	1,034	1,036	6.5	3.1	3.1
東北亞									
中國	29,414	38,191	39,889	28	31	32	7.9	5.3	5.4
蘇聯 / 俄羅斯	364,715	57,107	56,800	1,308	390	380	16.1	5.3	5.1
日本	31,847	38,482	40,383	264	305	319	1.0	1.0	0.9
朝鮮	6,158	2,086	2,100	302	97	98	23.0	14.3	14.3
韓國	9,323	10,461	12,088	227	225	257	5.1	2.4	3.0
台灣	9,541	14,447	14,964	492	668	687	7.0	4.8	5.2
東南亞國家 聯盟成員									
汶萊	304	386	402	1,356	1,217	1,240	6.0	6.7	6.7
柬埔寨	---	155	176	---	15	17	---	5.1	5.1
印度尼西亞	3,469	967	1,502	21	5	7	2.8	0.8	1.1
老撾	81	34	22	23	7	4	7.8	2.6	2.3
馬來西亞	2,614	1,891	3,158	168	88	146	5.6	2.6	4.0
緬甸	1,302	2,142	1,995	35	45	42	5.1	5.0	5.0
菲律賓	702	1,521	1,627	13	21	22	1.4	2.3	2.1
新加坡	1,760	4,936	4,696	688	1,275	1,174	6.7	5.6	5.6
泰國	2,777	2,124	2,638	54	35	43	5.0	1.7	1.9
越南	3,556	943	890	58	12	11	19.4	3.5	3.1
總計 / 平均 東南亞國家聯盟	---	15,099	17,106	---	272	270.6	---	3.59	3.69

來源：《軍事平衡 2000/2001》，戰略研究國際學會 (IISS)，牛津大學出版社，倫敦，2000 年，第 297-299 頁。

附件 2 東亞軍事編製人數 (以千計)

	軍事編製人數		預備役	准軍事
	1985 年	1999 年	1999 年	1999 年
澳大利亞	70.4	55.2	27.7	1.0
美國	2,151.6	1,371.5	1,303.3	89.0
東北亞				
中國	3,900.0	2,820.0	1,200.0	1,000.0
蘇聯 / 俄羅斯	444.0	376.0	1,657.5	26.7
日本	243.0	242.6	48.6	12.0
朝鮮	838.0	1,055.0	4,700.0	189.0
韓國	598.0	672.0	4,500.0	4.5
台灣	5,300.0	1,004.1	2,400.0	478.0
東南亞國家 聯盟成員				
汶萊	4.1	5.0	0.7	3.8
柬埔寨	35.0	139.0	---	220.0
印度尼西亞	278.1	299.0	400.0	200.0
老撾	53.7	29.1	---	100.0
馬來西亞	110.0	105.0	40.6	20.1
緬甸	186.0	343.8	---	85.3
菲律賓	114.8	110.0	131.0	42.5
新加坡	55.0	73.0	275.0	108.0
泰國	235.3	306.0	200.0	71.0
越南	1,027.0	484.0	3,000.0	40.0
總計 東南亞國家聯盟	2,099.0	1,893.9	---	890.7

來源：《軍事平衡 2000/2001》，ibid

目 錄

09 引言

13 新秩序與傳統安全困境

16 力量新平衡的重新排列

22 地區的分歧與紛爭

31 潛在的軍備競賽

35 東亞安全和穩定的根本性決定因素

35 美國的困境

40 中國——帝國還是帝國主義？

51 結論和建議

57 附件

千禧今天

“千禧/今天”這套叢書題材新穎、涉獵廣泛。幾位作者分別從政治、社會、法律、科學、教育和科技等角度揭示千禧伊始，在我們這個日新月異的社會裏存在的問題和答案，以及人類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踏入千禧年，澳門國際研究所一直致力舉辦研討會和學術交流活動；今天，我們將其中精彩的論文集結出版，以饗廣大讀者。

(這套叢書由澳門國際研究所屬下亞太地區策略研究中心負責出版。)

ISBN 99937-620-7-5



9 789993 762072